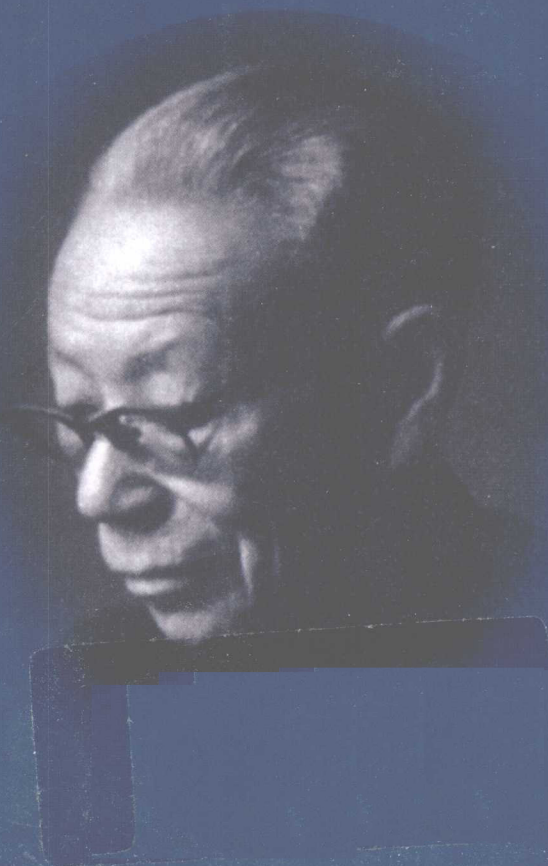




吕叔湘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文集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622-8

I. 吕… II. 吕… III. ①吕叔湘(1904~1998)—纪念文集②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K825.5-53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84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622-8

2010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¼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人民的语言学家永在——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江蓝生 1
一代宗师,学界楷模——深切怀念吕叔湘先生的教诲:严谨,谦逊,与人为善	胡明扬 4
怀念吕先生	唐作藩 8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郭锡良 10
吕叔湘先生与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	陈章太 15
指路灯——读《〈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	曹先擢 22
吕叔湘先生辩证的汉语语法观	田小琳 28
试论吕叔湘先生对我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王菊泉 37
缅怀吕老	王 镁 51
怀念恩师吕叔湘先生	王海藻 55
吕叔湘先生和《论衡索引》	程湘清 61
吕叔湘先生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苏培成 64
认真推行《简化字总表》——学习吕先生《字形规范问题答客问》的思考	高更生 72
吕叔湘先生在清华——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黄国营、于照洲 77
吕叔湘先生在苏州中学	胡铁军 80
深切的怀念——纪念吕叔湘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李鸿简 87
一代宗师 春风化雨——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袁正守 89
试论动宾式动词	张 斌 92
语法研究的目标——预测还是解释?	沈家煊 97
汉语双项名词句与话题—陈述结构	陈 平 108
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	黄正德 126
重视动名关系研究——吕叔湘“语法分析论”学习札记	吴为章 144
话题、协同化及话题性	史有为 153
从 subject 的功能分析看汉语句子的主语概念——语言学方法散论	杨成凯 183
层次和核心问题再探讨	陆丙甫 195
存现句里的专有名词宾语	张伯江 207
北京话里新生的语法手段	方 梅 211

说《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	邵荣芬 227
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	梅祖麟 241
关于连动式的历史及发展的几点考虑	贝罗贝、熊慧如 249
古代汉语中的“日中”和“中日”	高嶋谦一 259
动词“吃(喫)”的来源	平山久雄 267
从助动词“解”、“会”、“识”的形成看语义的演变	蒋绍愚 275
再谈中古汉语处置式	曹广顺、龙国富 286
从反复问句的使用情况看《元曲选》宾白的明代语言成分	李崇兴 301
马王堆汉墓帛书祝由方中的“由”	李家浩 308
从“善”等谈上古的句法与词义分析	李佐丰 315
清代三种漳州十五音韵书比较研究——《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增补汇音》和 《渡江书十五音》三种韵书比较研究	马重奇 335
谈“破”——汉语某些动词的类型转变	徐 丹 348
蒙古时期的一道白话碑	杨耐思 357
论语气助词“啊”的历史渊源	钟兆华 360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解决了汉语语音韵律分析的难题	吴宗济 372
从语音合成看汉语的重音结构	曹剑芬 377
论量词的功能与演变——汉语、景颇语量词比较	戴庆厦、蒋 颖 387
辞书编写的借鉴和提高——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刘庆隆 398
词语翻译与语言规范化——几个用例的分析	黄长著 404
后记	413

人民的语言学家永在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蓝生

吕叔湘先生辞世已经六年，今年是先生百岁诞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隆重纪念，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和我国内地及港、澳、台等地的海内外二百多位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怀念这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语言所编辑的《吕叔湘》画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位语言学大师的生活道路和学术历程。

在我的印象中，吕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许多与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吕先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志向根深蒂固。他亲见旧中国积贫积弱、黑暗腐败的现实，亲历战乱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因而他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社会，珍惜新生活，以“越活越年轻”的心态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时曾说：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

吕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古典文献和西学的功底；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又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既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立足于汉语的实际，坚持求真务实的学风，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语言学开始在我国传布流行，有很多学者都惊奇地发现，吕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有不少跟当代语言学尤其是功能语法学说的要义不谋而合。上个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界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

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是把界限模糊看做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吕先生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当学界盛赞“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 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吕叔湘全集》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谦逊与诚实的品德;但不可否认的是,吕先生心有灵犀,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应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是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回顾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吕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不得不为他的学术研究中所蕴涵的当代语言学精神而赞叹。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把通和专、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文献研究和活的语言研究等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他一生中直接参与并开始关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发行4000多万册,不仅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而且还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跟他主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汉语八百词》一起,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他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77岁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当面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像他这样的大学者,能这样自觉地以学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服务,能这样不惜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普及语文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能这

样谦虚、亲切地跟人民群众沟通、交流，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境界啊！每当回忆起这些事迹，都令人肃然起敬。六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做《人民的语言学家》，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说起吕先生事业的成功，不得不提起吕师母和他们的家庭。吕先生家家风敦厚朴实，夫妻相敬，兄弟友于，尊长慈爱，子女孝顺，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民主精神。吕先生捐款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资助生活有困难的学者，都得到了家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吕先生家，吕师母是最有凝聚力的人物，七十多年中她与先生同甘共苦，悉心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是先生事业的坚强后盾。吕师母比吕先生仅小半岁，今年百岁初度，仍能生活自理，真是大德大福之人。在纪念吕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也要为吕师母祝福，祝吕师母身体康健、福寿齐天。

吕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其实仍旧和我们在一起。打开各种语言学期刊和一本本新出的语言学著作，在参考文献中吕先生的论著总是赫然在目，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依然在启迪着、影响着后来的学者，成为后人学术创新不得不参考的重要成果。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这些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势头良好，新的研究基地陆续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层出不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少。总之，我国语言学事业后继有人，我国语言学事业大有希望，吕先生，您就放心吧！

回想二十六年前，我和杨成凯、李崇兴、王菊泉、周流溪、黄国营、陈平等六位师兄弟有幸成为先生的关门入室弟子，亲聆教诲，沐浴春风，度过了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幸福时光，师恩如山，终生难忘。现在六位师兄弟都学有所成，聊可慰藉先生于九泉。六年来，我经常想起吕先生，每当我计划写一篇文章而思路理不清时，就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跟他谈谈一定能得到启发；每当自己研究偶有心得时，也想起吕先生，要是先生还在，让他也分享我的愉快，庶几可稍减他老人家对我这些年未能专心于学问的失望……

六年前，吕先生的骨灰埋在香山一处山坡上，没有任何记号，陪伴吕先生的是山峦翠柏，是阵阵松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愿辛劳了一生的吕先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安息吧。

吕叔湘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人民的语言学家吕叔湘不朽！

一代宗师,学界楷模

——深切怀念吕叔湘先生的教诲:严谨,谦逊,与人为善

中国人民大学 胡明扬

吕叔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每逢过年过节,我还常常想到该去看看吕先生了,可是又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离开我们而去了,不禁愕然,又不禁眼睛酸酸的。我无缘得列先生门墙,但是一直在内心认为自己是吕先生的学生。实际上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都要进城去看吕先生,而吕先生也总热情接见我,跟我畅谈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动态和近期的热点问题,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往往谈到晚饭时分就留我吃饭。我这个学生,没缴半分学费,也从来不给先生送礼,倒经常在先生家吃饭,的确未尽弟子之礼;可是吕先生对我多方教导,大力提携,完全把我当入门弟子看待,这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有些情景一直历历在目:先生在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人了;我到协和医院病房去看他,他认识我,还跟我说了半天话,让值班护士十分惊讶,我临走她把我拦住,问我是谁,让我留下姓名地址,她说吕先生已经好几天什么人都不认识了,怎么还认识你?吕先生当时的神情音容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此我常常以为先生还在,过年过节应该去看看。

吕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他开创了近代汉语研究,他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成就,特别是他对语法现象细致深入的描写分析和深入浅出的阐说,至今无人能超越。我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以后,教师常常苦于没有可以参考的著作,而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仍然是唯一一部可以参考的书,其中关于量词前数词“一”的省略的用法迄今没有更细致的描写。以吕先生的观点和思路为主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中国语法学史上永远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而署名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吕先生的影响和手笔。他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实际上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现代汉语语法学史”或“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吕先生以他一贯的严谨务实的态度——分析了各家语法的长处和不足之处,探索解决的方案,而不轻易褒贬,绝不像后出的一些语法学史那样,对待同样是引进和借鉴的西方语言理论和方法,却动不动要贬他人为“模仿”,吹自己为“创新”。除了在学术上作出无可争议的重大贡献以外,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先生在团结、领导、组织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共同为促进中国的语言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当今学术规范严重失衡、学术道德日益沦丧的历史时刻,吕先生堪为学界楷模的学术风范和道德人品就更值得后学继承发扬了。

我在1955年发表的第一篇语言学理论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大批判文章,批了高名凯先生,也批了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可是我和吕先生的交往却就是从发表这篇大批判文章开始的。吕先生不但不计较我对他的无理批判,而且还收留了我这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学的门外汉,从读什么书、什么问题该请教哪位前辈教起,把着手热情教导、点拨,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是这是事实!他对于我那篇大批判文章没有直接批评,只是说了一句“做人写文章要与人为善”,告诉我高先生为此很难过。不是吕先生教导我,我很可能会误入歧途,但吕先生挽救了我。那么是不是吕先生根本就忘了我当时对他的大批判呢?不是,事隔近二十年以后,吕先生一次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学术会议上谈“动补”关系的复杂性的时候,提到了他过去说“动宾关系非常复杂,是说也说不完的”,他说“当时胡某人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实际上就是太复杂了,一时谁也说不清楚”。我当时在座,脸上直发烧。不过我也意识到吕先生不是没注意或是忘了,而是吕先生的确对年轻人非常宽容,即使我批了他,他也完全不计较,处处与人为善。可是有的人不要说对批评他的人绝不宽容,就是跟他的学术观点稍有不同的人也绝不放过,直到干预这个人在本单位的职称评审工作。这样来比较,吕先生的学者风范和长者风范就更加突出了。有一位否定一切而只承认一切从自己开始的年轻人多次无中生有地批判吕先生,但是吕先生还是宽容了他,还特意指定破例邀请他参加全国性的会议,可是这位年轻人事后反而指摘吕先生压制他,不让他参加学术会议,但是吕先生没有反击,一笑了之。吕先生对人一贯宽容,对年轻人则更加宽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年纪大小都应该好好学习的。

吕先生的宽容不等于无原则的迁就和纵容,或对错误的观点保持沉默。吕先生非常讲究方式方法,这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他总是与人为善,不愿意伤害他人,即使这个人在某个方面有错误有缺点。1981年在哈尔滨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的闭幕式上他发言说,“现在有人常常喜欢说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别人的观点是极端荒谬的。可是他没有想一想,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那么他就不是‘唯一’的了”。当时多数人明白吕先生批评的是哪位先生,可是吕先生没有点名,而且话说得那么婉转,那么语重心长,那么以理服人,受批评的人如果不是冥顽不灵,对于长者善意的提醒就肯定会考虑考虑的。又如吕先生不太同意不加条件制约的句式转换,他在《语文杂谈》中有一篇短文《句式变化》,列举实例说明同样的句式,有些动词的相关句式能变换,可是换了一个动词就不能变换了。吕先生只是正面阐说自己的观点,没有批评持自由转换的人,真正做到了对事不对人,没有提名道姓,更没有说别人“以偏概全”等等,这样的讨论方式不伤人,因为像吕先生这样的学术地位,他要是提名道姓地公开批评某人的某种观点,谁都受不了,也就无法平心静气地相互进行学术探讨了。非常遗憾的是语言学界没有推广和继承吕先生这种处处与人为善的优良学风,所以至今仍缺乏一种轻松的自由探讨的学风,仍然不是吹捧就是批判,

很难开展不同观点之间的友好善意的讨论和切磋。

吕叔湘先生治学严谨是众所周知的。自从我结识吕先生以后,他一再教导我做学问要严谨,首先要分清自己的和别人的,是别人的一定要注明详细出处,要注明书名、篇名、出版社、版本、页码,如果是译本,最好查对原文,因为译文可能有错;还特别叮嘱,即使是口头听来的别人有价值的观点,也必须注明是听哪位先生说的,千万不能窃为己有。吕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他自己就这么做。他就公开承认“在我写《要略》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汉语语法还不久,胸中并无成竹,处处遇到困难。因为词类活用问题不好处理,认为叶氏的词级说可以渡过难关,就拿来用上”(1956,修订本序二)。吕先生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叶斯伯森的理论,不仅并不影响他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和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充分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和严谨谦逊的优良作风。可是现在不少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抄袭他人成果,特别是欺侮别人不懂外文,把外国学者的创见和成果稍加包装调整,或者一字不改地译成中文,作为自己的成果来发表,以此欺世盗名。更令人遗憾和忧虑的是不仅年轻人这么干,一些已经著名的年长者也这么干,上行下效,学风败坏,真令人寒心。吕先生不仅写文章很严谨,而且私下谈话也同样非常严谨,实事求是。70年代有一年春节我去看望吕先生,谈到汉语句子的核心是动词的时候,我说“说汉语句子的核心是动词,这是您的观点”。吕先生立刻纠正我说,“最早提出这种观点来的是俞敏,不是我”。这是一次关起门来的私下谈话,不是公开发表文章,但是吕先生也不用沉默来表示默认,而是立即加以纠正,从这次谈话更能看到吕先生的为人。

吕先生还教导我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特别不要强不知以为知。60年代初,吕先生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老乞大》、《朴通事》两部朝鲜近代的汉语教材的汉语口语文本,准备创建一个新的以吕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句段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化的语法体系,让我跟他一起干。他说,“语音我不在行,你先把语音部分搞一搞”。吕先生的专长是语法,但是绝不是不懂语音,他晚年写了丹阳方言语音方面的文章说明他只是专长不在语音而已,说“不在行”是实事求是的,当然也是谦逊。我关于谚文对音的文章写完了给他看,他又说,“语音我不行,我得请我的老师陆先生看”,然后就把我带到后院陆志韦先生那里请陆先生审读。吕先生早年在东南大学听过陆先生的心理学课程,一直对陆先生执弟子礼,这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现在流行一种风气,有用的才是老师,没用的就不是老师,只听过一门课,谁还认谁是老师!

吕先生还教导:“写文章,下结论要留有余地,话千万不要说死,语言现象太复杂了。”吕先生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处处留有余地,因为他看到的、知道的实在太多了,非常全面,不像半瓶醋那样的人敢于处处说一不二,斩钉截铁地下结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唯一科学唯一正确的。可是不少年轻人不太喜欢吕先生这种严谨谦逊的学风,我的一些研究生就向我反映,他们不太喜欢读吕先生的著作,说吕先生总是说张三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可是不全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完善,李四解决得比较妥善,可是李四在另一个问题上不如张三,这么绕

来绕去,似乎各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可是又都不是绝对正确,而且还不知道吕先生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这怎么让人去教学生?他们喜欢说话绝对的先生,这是唯一正确唯一科学的,其他观点都是极端荒谬的,那样很明确,好教学生。其实,吕先生不是故意卖关子,故意模棱两可,而是他知道得太多了,明白语言现象的复杂性,知道说一不二往往会误导年轻人,而且往往事后会证明说一不二的说法是错误的,而留有余地的说法倒永远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要挑吕先生著作的毛病很难,因为他从来不说没根据没把握的话,即使是有根据有把握的话也不说死,总留有余地,错了,也很容易修正。不像有的先生就是说一不二,斩钉截铁,明明错了还要死辩,结果只能越描越黑。吕先生的严谨学风在语言学界是大家公认的,非常值得大力提倡和继承发扬。现在剽窃抄袭和信口开河、缺乏最起码的语言学常识的胡说八道等不良学风闹得沸沸扬扬,提倡严谨、提倡吕先生一贯倡导的在务实基础上的创新应该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我和吕先生本来毫无关系,可是吕先生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教育、培养我这么一个门外弟子,他图个什么?我还从来不给吕先生送礼,倒是经常在他家吃白饭。据我所知,吕先生也非常关心所里的年轻人在学术上的成长,常常给年轻人出主意该研究点什么,可是由于50年代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太偏太专了,年轻人要完成吕先生交下来的研究任务有困难,而这又不是公事,是私事,所以没有想方设法去钻研,结果就没有下文了。所里有的年轻同志经济上有困难,吕先生甚至拿自己的工资去帮助这些同志。他是所长,完全可以用公款来补助这些同志,那也是做了好事,可是他不那样做,而是用自己的工资来帮助别人,从这一点上来看,吕先生不仅做学问十分严谨,而且做人也非常严谨,所以人们常常说做学问就是做人,道德文章是分不开的,文章好首先是因为道德高尚,吕先生之所以成为学界楷模正因为道德文章都足为后学楷模。作为一个无缘得列门墙的编外弟子永远不能忘记吕先生的教诲,至于怎样来报答吕先生的恩情,我只能永远谨记先生的教诲,尽可能按先生的教诲去做人做学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以此回报先生的教诲,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只能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永远向往之。

怀念吕先生

北京大学 唐作藩

五十年前即1954年8月下旬我们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生从广州调来北大。9月初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先生在翠花楼宴请从中大来的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周达夫先生和黄伯荣讲师；我这个小助教亦荣附骥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同时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吕叔湘先生和陆志韦先生、丁声树先生。王力先生和吕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他们已有多年的通讯联系，并曾互赠语法著作。记得那次相聚大家特别高兴，气氛非常热烈。

我第二次见到吕先生，是在两年之后，王力先生派我和许绍早兄去听取吕先生对《汉语史讲义》（“语法发展史部分”）的意见。那时吕先生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12号楼二层一套三居室里。吕先生对王先生送给他的讲义油印本看得很认真、仔细，跟我们逐章逐节地谈了他的意见，我们在带去的讲义上一一作了记录，回去向王先生汇报。王先生要我们在修订《汉语史稿》（中册）时，认真考虑吸取吕先生的意见。吕先生与王先生的诚挚友情和谦虚、严谨的学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年秋季开学时王先生又请吕先生来北大讲授“《马氏文通》研读”。不仅本科高年级学生选修这门课，而且我们汉语教研室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也都去听课了，受益匪浅。由吕先生开创的这门“《马氏文通》研读”后来成为我们北大汉语史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自上世纪50年代末我开始为汉语专业本科三年级讲授“汉语史”，在备课时也试着作点语法史的研究。60年代中我写了一篇短文《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投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请主编吕先生审稿。有一天吕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那时他住在端王府附近），指点我这篇小文的不足，让我再作些修改。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文修改后直到1980年才发表在“文革”后复刊的《语言学论丛》（第六辑）上，但我并未忘却吕先生的教诲。

此后虽然也不时见到吕先生，但往往是在各种会议上。由于他很忙，找他的人又很多，我只是到他面前问问安就走开了。1980年王力先生八十华诞，倪海曙先生约请叶圣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发起筹备祝寿活动，除了当年8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隆重庆祝会，还要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吕先生与王力先生交情笃厚，不仅写了学术论文（《〈马氏文通〉语法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王力先生1986年5月3日病逝后，吕先生翌日晚即写了悼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5月16日）上。1990年

8月10—12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吕先生收到了出席8月10日纪念会开幕式的邀请信之后,在8月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本月十日王先生的诞辰纪念会我是要争取参加的。只是近来的天气湿闷,气压低,我很不舒服,百事俱废。我希望到时候天气不再是这样。”结果终因身体不适未能与会,但他还是寄来了书面讲话。文字不长,但情真意切。他特别称赞王先生做学问“专一”与珍惜时间的精神。他说王先生“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在治学上。王先生也有社会活动,也有其他干扰,但他不让这些事情打乱他的工作”,吕先生说:“很多人常常遇到一些干扰,也许半天,也许只一两个小时,可是心收不回来,随随便便就把一天报销了。而王先生不是这样,事情一过,他又回到他的书桌上去了。”作为老朋友,吕先生是很了解王先生的。其实吕先生与王先生一样,都是做学问很专一的,他们那种“从不浪费一分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吕先生还非常关心《王力文集》的出版工作,他曾给我写过两次信询问《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1992年二十卷《王力文集》全部出齐,吕先生在来信中说:“王先生的集子出齐了,值得庆贺。我承蒙逐册惠赠,非常感谢。”

吕先生清正谦逊,宽厚待人,所以能健康长寿,活到九十四岁。晚年身体比较虚弱,住进协和医院疗养。大约是1997年秋天,王师母夏蔚霞先生让我陪同去医院探视吕先生。正好我也有这个想法。那天天气比较好,缉志师弟也正好有空,开车送我们到王府井协和医院。吕先生住在一间高干病房里,他让我们坐在外间客厅里,他虽然瘦弱一点,但精神还不错,还从冰箱里拿出荔枝来让我们吃。我剥了几个递给吕先生,他笑着吃了。这是吕先生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永远难忘。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北京大学 郭锡良

1980年10月在武汉召开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吕叔湘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学术报告,发表在《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报告讨论了推动我国语言科学前进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即“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在报告中吕先生说:“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吕先生指出:这两种偏向必须克服,中西必须结合,“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二个问题是“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吕先生在四个关系中为这个问题花的笔墨最多,他讨论了“理论从哪里来”、“如何对待前人的理论”、“理论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以及如何进行“观察、调查、实验”等多方面的问题。吕先生肯定了“理论从事例中来”(也可以说是“材料决定理论”);肯定了“科学成果是积累起来的”,“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辩证地论述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举了一个“散钱”和“钱串子”的故事,肯定了“散钱”的用处;最后强调了“观察、调查、实验”的重要性。第三个问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吕先生指出:“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而“语言的动态研究”的三个方面——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数理语言学——同样重要,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第四个问题是“通和专的关系”,这是从培养语言研究队伍来讨论问题的。吕先生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教学体制,对“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外国大学里边,教师一般要能教四五门课”;“我们这里则是以一人一门为常”。“我教古代,你教现代,他教理论;我教语音,你教语法,他教方言。”这样“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思路狭窄,不利于进步”。

吕先生的报告是把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对西学东渐以来学科如何发展所积累的共识作了一个总结。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先生写过两篇有关我国语言科学发展的重要论文《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分别发表在《中国语

文》1957年3月号和1962年10月号上。王力先生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倡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吕先生报告中所谈到的前三个关系,这两篇文章也都涉及了,后一个“通与专的关系”王力先生在《谈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也有论述。他说:“‘博’是指有广博的知识,‘专’是指在小范围内深入。研究要专,学习要博,博是专的基础。”(《王力文集》二十卷,318页)对比两位先生的观点,他们是多么一致或相近啊!在这些关系的处理上,不但王吕观点相近,还有罗常培先生、丁声树先生、季羨林先生、朱德熙先生、李荣先生等一大批前辈学者,他们也都是看法相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吕先生的报告代表了不少老一代语言学家的共识,也可以说它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如何看待这一指导思想呢?学术界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有的人把上个世纪我国引进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看做少数人的事,甚至把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同时斥责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扬言这个不懂历史比较法,那个也不懂历史比较法,乃至抹杀半个世纪以来内地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成绩。这是出自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可是国内却仍有人甘做这种论调的应声虫。季羨林先生说:“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入中国,一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到什么碰撞!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14页)季先生这段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因此,如何对待吕先生说的四个关系,这是必须分辨清楚的大问题。

吕先生说得好,“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和外的关系”只能是中西结合,照搬西方的一套,“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大家知道: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把王(王引之)俞(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中西结合的;高本汉的古音构拟是在清代古音学家研究的基础上用音标来说明古音的系统,这也是中西结合的。在理论和材料(事例)的关系上,吕先生强调“理论从事例中来”,散钱比钱串子有用,容易被人误会是轻视理论,其实不然;吕先生肯定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要综合参考这些理论来观察语言现象,进而“摆事实,讲道理”,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也可以上升为新理论。吕先生反对的是空谈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学风,不赞同“喜欢搞理论”而不积极探索具体语言的系统及其变化规律。在“动和静的关系”上吕先生提出语言的应用研究和语言的本体研究同样重要,应该互相尊重、互相促进。由于能正确对待这三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语言学科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因此,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明显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内地语言学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不容抹杀。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19世纪末就已孕育,切音字运动冲击着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藩

篱，《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河。甲骨文出土为“古文字学”新学科提供了物质条件。“五四”白话文运动催生了现代汉语语法学，20 世纪二三十年留学欧美的学生带回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催动了三四十年代汉语语法学、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开拓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和推广为清末以来的切音字运动作了总结，它对普及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对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影响巨大，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是首先无疑应该给予肯定。还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虽然也受到了“左”的影响，但是由于它跟政治离得较远，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取得的成绩也较多。下面作个粗略的回顾：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历时语言学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丁声树先生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陆志韦先生等的《汉语的构词法》的出版以及汉语词类问题、汉语主语宾语问题、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为后来汉语语法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显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思想方法受到了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在袁家骅先生指导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辑出版的《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是对全国方言普查成果的小结；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等执笔的《昌黎方言志》是在全面、深入调查基础上具有创新、提高性质的方言志样板。

这些都是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把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同我国的语言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我不知道，那些抹杀内地语言学研究成绩的人是闭目塞听呢，还是盲目无知？居然认为内地学人对西方语言学一无所知。其实，当时中国虽然由于外遭封锁、内存闭塞，使我们对西方语言学的新进展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对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信念却没有动摇。上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议定了四部西方语言学名著作为语言学理论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它们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特的《语言论》。提议并参与决定的主要学者就是王力、丁声树、吕叔湘三位先生。萨丕尔的《语言论》已经有人翻译，1964 年出版；其他三部著作我们落实了翻译力量，1965 年翻译初稿都已完成，由于“文革”动乱的爆发，80 年代才得以出版。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语言学迎来了全面繁荣时期。多方面的成绩，我们用不着一缕述，只需择要作一说明。先说语法，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法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较大进展。这里只举两点：一是现代汉语的句法分析方法已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二是汉语语法的历时研究蓬勃开展了专题语法研究、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这些方面的专著都不少，论文恐怕更是以千计。再说词汇，词汇研究的广度、深度也是有进展的。义素分析法被广泛引入词义分析中，同义词、同源词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这方面受人瞩目的成果。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先后任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摆脱了训诂式的释义方式，体现出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精神，是 20 世纪我国科学性最强、质量最高的辞书。徐中舒任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注意字形、字音的